

中美关系史丛书·专著

# 中美关系史

(1911——1950)

- 陶文钊 著
-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张德尚

封面设计 张旭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陶文钊 著

**中美关系史(1911—1950)**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峡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8.5 插页 5 字数 443 千

1993年10月第一版 1997年3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3,000

\*

ISBN 7-5366-2250-3/D · 121

定价: 20.00 元



**陶文钊**，浙江绍兴人，1943年生，1964年杭州大学外语系毕业，1982至1984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等处进修两年，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担任该所研究员、近代中外关系史一室兼国外史学动态研究室主任、美国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和《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的写作，发表有关近代中外关系史的论文和学术评论多篇，编有《费正清集》，合编有《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第三辑，《社会变革比较研究》，参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数种中俄关系史专著的译、校。

# 序

---

## 章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2月22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第一艘远航中国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毛皮、羽纱、棉花、铅等货品,从纽约港起航了。商船绕好望角,经印度洋,行程20900公里,于8月28日驶抵广州。售完货后,它购进茶叶、丝绸、瓷器等,沿原航线返回,于1785年5月10日到达纽约。从此,为浩瀚的太平洋分隔在东西两半球的两个国家建立起了贸易关系。

为什么在美国于1783年9月刚刚赢得独立后,美国商人就远渡重洋,来华贸易呢?

早在美国独立前,北美地区和中国便有了贸易关系,中国的茶叶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中国的瓷器也已进入普通人家。但当时北美大陆的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

司所垄断，北美十三州的商人不能直接进行对华贸易。经过长期的（1776-1783）艰苦的独立战争，北美十三州赢得了自由，但新生生的合众国面积仅仅3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0万，这个松散的联邦面临着国库空虚，财政竭蹶的严重困难。英国仍然把美国当作敌国，对美国货物课以高额关税，不许其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英属西印度群岛；法国、西班牙等也对美国实行贸易歧视；北美十三州的国内市场又十分狭小，所有这些情况迫使美国商人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东方，首先是中国。

“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共投资12万美元，利润达3.7万多美元，为本钱的25%。它的首航成功表明，一个新近独立的国家为东方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作为平等的贸易伙伴所接受，这就为急于开拓对外贸易的美国商人展示了一个赢利的航向，理所当然地被美国各界视为一件大事。纽约各报竞相报导“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的消息，美国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该船的商务代理人山茂召写了一个关于此次驶华的详细报告，交给了外交部长约翰·杰依（John Jay），报告被转交给国会，并受到褒扬。“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燃起了新英格兰商人开拓东方市场，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美国出现了对华贸易热。

但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对外国的“体恤之恩”，<sup>①</sup>对于外商在华贸易和行动加以种种限制；对外贸易限在广州一口，由专营对欧美贸易的行商（即所谓公行，通称十三行）组织起来办理，行商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居住和行动，等等。尽管如此，美国对华贸易仍有迅速发展，1792年后，美国对华

<sup>①</sup>这是乾隆1793年致英王乔治三世信中的话。见梁廷枫：《粤海关志》，第33卷，第7页，第26卷，第21页，道光年间刻本。

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19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华贸易仅次于对英、法、古巴的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居第四位。据清朝文献记载，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54年间，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为4519艘。其中1/4(1150艘)为美国商船。<sup>①</sup>在广州从事贸易的美国商号有九个，占外国商号总数1/6，其中最大商号早期是珀金斯公司，19世纪20年代后是旗昌洋行。这一时期中国输美的主要商品是茶叶、生丝和丝绸、土布，美国输华的货物有运自本国和北美大陆的土特产，如人参、皮毛和棉花，还有从欧洲贩运来的工业制品，如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

中美贸易对两国是互利的，它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中国提供了硬通货。美国商人从对华贸易中发了财，大多数美国商人对广州贸易能使他们有机会发一笔小财表示满意，他们便把商业资本的部分或全部转化为工业资本，投资于国内工矿铁路各业，或从事金融、房地产事业。珀金斯(Thomas Perkins)的助手及公司代理人约翰·顾新(John P. Cushing)1803年到广州主持生意，1831年带着近100万美元回国。美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er)在1800年到1809年从广州贸易中获利50万美元，其中大部投资于曼哈顿的地产业。<sup>②</sup>北美在殖民地时期，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工业品多依赖进口。独立后，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农业国，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供出口。因此在早期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享有顺差，美商主要用白银支付逆差，从而使中国得到相当多的硬通货。据统计，1805至1833年间美国输华货物总值为50294001

---

<sup>①</sup>根据《粤海关志》第24卷第37-41页所列数字统计得出。

<sup>②</sup>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Michael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第11页，纽约，1983年版。

美元，白银为89,447,817美元，为货物总值的 $1\frac{3}{4}$ 倍多。<sup>①</sup>

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减少贸易逆差，美商从19世纪初开始贩卖鸦片。鸦片毒害人们身心健康，清政府是在1729年就明令查禁，以后又一再重申不得进口。但清政府愈禁，走私鸦片的非法利润也就愈高。起先是葡萄牙、荷兰商人从事这一罪恶勾当，后来英商成为主要鸦片走私者。美商走私鸦片大约始自1805-1806年间。因为是走私，人们无从得知其确切数额。有的资料表明，1816-1833年间美商走私鸦片总额6,495,901美元，约为输华货物总值42,705,871美元的13%。<sup>②</sup>美商的鸦片走私活动是早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污点。

从1875年起，中国也有极少数人去到那个遥远、陌生的国度。根据美国官方统计，从1820年到1841年华人至美总数才13人。活跃的投资市场也吸引了中国商人的一些资金，他们或者与美商合做生意，或者赞助美国人在广州开医院，或者借钱给美商在美国发展事业。在中国缺少资本主义发展土壤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商人的财富成为美国早期工业资本的一部分。

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中美两国间宗教和文化联系也产生了。1830年，美国海外传教会在美商赞助下派裨治文(Elijar C. Bridgman)和雅裨理(David Abeel)来中国，开美国传教士来华之先河。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好感，扩大教会的影响，他们在中国从事出版、译述、医务和教育等工作。由裨治文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1832-1851，又译作《中国汇报》)广泛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历史、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情况，对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和促进中美贸易起了作用。1834年12月，在华英美传教士及一部分商人组成中国益智学会，编印通俗宗

---

①根据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15-116页表格统计得出。

②根据《中美关系史论丛》第115-116页，表格统计得出。

教宣传品，并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史地知识。裨治文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是一本用中文撰写的全面介绍美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它成为中国朝野了解美国的主要依据。早年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先进的爱国者魏源在增订《海国图志》时，有关美国的材料几乎2/3取自该书，梁廷枏的《合省国说》也以此书为主要资料来源。

美国教士还在广州开设医院。1835年10月，传教士彼得·伯驾(Peter Parker)开设了“眼科医局”，受到广州各界的赞扬，六个星期之内就有450人到该医局就诊，行商伍敦元还给了不少资助。林则徐到广州后，也曾间接向伯驾求医问药。

美国教士还通过创办学校直接向青少年灌输基督教义。1839年勃朗(Samuel R. Brown)夫妇在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校，但在科举制度下，中国士大夫阶层把子弟送到外国人办的学校就读不啻是断送他们的前程，因此入学者寥寥无几。1841年只有六个学生，其中之一是容闳。1842年学校迁往香港，鸦片战争后，由于迫切需要通事(翻译)人材，入学人数才有所增加，1845年达30人。学校课程除汉语外，有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音乐等，这是在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它给予学生的知识自然比中国封建的学塾丰富。勃朗夫妇于1847年返美，容闳等三名学生随他前往美国。这是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容闳等在勃朗及美国友人帮助下，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芸松学校。容闳后来考上耶鲁大学，成为该校第一名中国学生。勃朗是第一个向中国学生系统传播西学，促成中国学生留美的外国人。

由于清政府禁止基督教流传，也由于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传教士虽然多方设法，但传教活动却收效甚微。到1839年领洗者不到100人，而且主要是给外商服役或经营外贸的下层人士。



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间存在着贸易和文化交往，但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虽然早在1786年就委派了驻广州领事，但根据政府的规定，领事没有与所在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权力，清政府也不承认各国领事具有外交官身份，而只把他们当作各国商人的首领，让他们与行商而不是官府打交道，因此美国领事从未起过外交官的作用。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是山茂召，这一职位是为酬偿他在独立战争中的功劳的荣誉职衔。到1840年美国领事先后换过六个，都是商人兼任，均无薪金，国务院（1790年前为外交部）从未向他们下达训令，他们也很少向国务院汇报情况。

这一时期在美国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一般都能得到公平处理。较之英国商人，美商也比较守法；而一旦他们触犯了中国刑律，便受中国法律制裁。1821年的特拉诺瓦(Francis Terranova)事件就是一例。特拉诺瓦是美国商船“艾米里”号上的意大利籍水手。1821年9月25日他与卖水果的中国妇女郭梁氏发生口角，用船中瓦缸击伤郭梁氏头部，使其落水身亡。番禺知县传美国领事和该船船长共同验尸，并要求交出凶手受审。美国领事起先不肯，地方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命令停止所有美国船只的交易。美商震惊，被迫交出犯人。特拉诺瓦按清律处死。另一方面，清政府也保护美商的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1819年，广州蛋民(水上居民)李奉广勾结一伙人抢劫美国商船，打死5名美国人。广州当局立即将犯人捉拿归案，分别处斩。

总之，经济上互利、政治上平等是早期中美关系的主流，但是，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扩张欲望与清朝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力图与世隔绝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深刻冲突，已经孕育着改变这种平等互利关系的因素。

自从英国在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轰开了

古老中国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便进入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期，即资本主义大国通过武力威胁、侵略战争或其他手段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时期。

《南京条约》的签订拆除了列强入侵中国的藩篱，美国政府紧接着采取了行动。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情况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顾盛(Caleb Cushing)于1842年12月27日写信给泰勒(John Tyler)总统，建议遣使赴华，与中国订立与《南京条约》相类似的条约。泰勒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委任顾盛为赴华特命全权大使。1843年5月8日，国务卿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根据从事对华贸易的美商的意见，训令顾盛来华获得英国人已经取得的全部利益。并指示他径直前往北京，向中国皇帝交上总统国书。

顾盛于1843年7月31日离华盛顿，翌年2月24日到澳门。清政府认为“各国纷纷请觐”、“与旧制有乖”，拒绝他进京。顾盛威胁广东巡抚说：“按西洋诸国成规，若不款外国使臣，即是欺藐其国，是与人以出师之名矣”，<sup>①</sup>他还命令美国军舰“没兰地湾”号闯过虎门，开到黄埔，借口鸣礼炮，进行恫吓。清政府无奈，派出新任两广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澳门与顾盛谈判。对顾盛来说，进京或威胁进京是顺利订约的手段，而耆英却把维护清朝的“定制”、阻止顾盛进京作为他谈判的主要目的，因此对顾盛提出的条件几乎无不相从，经过半个月交涉，耆英和顾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844年7月3日在望厦村订立条约34款。<sup>②</sup>耆英认为《望厦条约》“大致尚与新定章程[指《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约略相仿”，“似与通商大

① 《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第31页。

② 约文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51-57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局无碍”，<sup>①</sup>实际上，美国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了中英条约中除割地、赔款的种种特权，此外还获得了更多的权益。

顾盛自诩有16处超过了中英条约。这些新的权益主要是：

1. 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规定，无论美侨之间，美侨与中国人，还是美侨与其他外籍侨民的诉讼案件，均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不得过问，从此美国人在中国就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了，这是对中国司法权的严重侵犯。

2. 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条约规定，中国日后要修订关税率（《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定税率为值百抽五），“须与合众国领事管官议允”，美国据此取得了参与确定中国关税的特权。

3. 侵犯中国领海权。条约给予美国兵舰到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的特权，中国官员非但不能管辖，还要“以平行之礼相待”，这样美国军舰便可以在中国领海自由游弋，在通商口岸任意出入。

4. 文化方面的特权。条约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开办医院，设立教堂，为美国在中国进行文化宗教渗透提供了便利，并成为列强进一步勒索的先导。

在顾盛谈判《望厦条约》时，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不仅为之充当翻译，而且为之出谋划策。顾盛初到澳门时，他们就对顾盛说，在中国人“没有同外国人较量的愿望或打算时，威胁是有效的”，以此帮助顾盛确定其谈判战略。顾盛感激裨治文和伯驾对他的帮助，赞赏他们“对中国有广博和准确的知识”、“功勋卓著，值得称赞”。<sup>②</sup>正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在1846到1857年间先后六次让伯驾负责公使馆工作。

《望厦条约》的订立使中美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这不能不给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

<sup>①</sup>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2卷，第1页。

<sup>②</sup> 《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第31页。

蒙上浓重的阴影。

中国开放五口通商以后，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中美贸易从1845年的950万美元增加到1860年的2,250万美元，其间美国对华输出增加了3倍。外国商品涌入中国，使中国小农业和家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受到冲击。中国土布原是欧美市场上的抢手货，1820年以前每年从广州大量出口。随着美国马萨诸塞州纺织中心的逐步建立以及英国纺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土布出口逐渐减少。到了19世纪40年代，棉织品成为美国输华最主要的工业品，美国出口的棉布有1/3到了中国市场。这就使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本来很发达的棉纺织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手纺车和手织机竞争不过纺织机械，中国社会自然经济解体的漫长过程开始了。

《望厦条约》订立后，美国在通商口岸的传教活动也发展起来。1842到1847年间，各国来华新教传教士共54人，其中美国传教士39人。截止1850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共88人。<sup>①</sup>他们在通商口岸设立印刷厂，印制宗教宣传品，创办学堂、医院，为以后传教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五口开放通商，外国开始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划定供外侨“居住和经商”的一定区域，即租界。租界首先在对外贸易中心上海出现。1845年，英国率先在上海划定租界。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William J. Boone)为首的美国圣公会教士在苏州河北岸虹口建造教堂，美国侨民也纷纷在那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文惠廉经与上海道台一再交涉，后者才允以该地作为美国人居留地，1863年6月才正式划定了界址。9月，上海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英美领事攫取租界的行政管理权、警卫权、司法权，两国并在租界驻扎武装部队，使之成为

---

<sup>①</sup> 李定一：《中美外交史》，第202页，台北，1960年版；《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第26页。

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的“国中之国”。上海公共租界的殖民地制度是旧中国租界中最完善、最典型的。

1856年10月，英法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政府认为这是坐收渔利的好机会。英法侵略军于1857年底占领广州后，美使列卫廉(William B. Reed)同英法俄使一起从广州北上。英法联军于1858年5月攻下大沽炮台后，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议和，并分别于6月26、27日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美使北上的目的原是为了修改《望厦条约》，要求赔偿美侨生命财产损失。清政府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联俄美以制英法。美国公使则利用清政府的幻想，诱使清政府在与英法订约之前(6月13日)订立了中美《天津条约》。事实使直隶总督谭廷襄认识到，“英法阳示其恶，美俄阴济其奸。强弱不同，其为贪得无餍，则均归一辙”，桂良等更报告说：美使“语言傲慢，借英夷为恐吓……不过欲享渔人之利”。<sup>①</sup>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坚持要在北京换约，并于1859年6月再次向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进攻，受到守军坚决抵抗。当时在场的美国舰队司令官达底拿(Josiah Tattnall)看到英法舰队受挫，不禁高呼：“血浓于水”，并称他不能“坐视白种人在他的眼前被屠杀”，指挥美舰向大沽炮台开炮，并援救受伤的英国士兵。<sup>②</sup>英法政府恼羞成怒，增派远征军来华，攻陷大沽，进犯北京，焚烧圆明园，最后于1860年10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北京条约》。根据最惠国条款，清政府给予一国的权利，其他国家亦得均沾，因此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这一系列条约，除了个别特殊规定(赔款、边界)外，

<sup>①</sup>《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2卷，第7页；第24卷，第33-34页。

<sup>②</sup>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第340页，纽约，1922年版。

其他利权都是各国共同享受的。它们主要是：

一、允准各国公使驻北京，为各国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并进而控制这个政府提供了方便。

二、规定新开沿海七口（牛庄、天津、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和长江四口（镇江、南京、九江、汉口），使通商港口增加到16个。

三、赋予英国人“帮办税务”的特权，使海关管理权落入外人手中；条约还规定子口税率为值百抽2.5。

四、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五、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内地传教。

六、准许华工到外洋别地工作，“毫无禁阻”，从而使外国侵略者称为“猪仔”贸易的掠卖华工合法化。美国由于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急需大批劳工。而当时美国东西海岸间交通不便，金矿投资商人要雇佣东岸白人，需要用船把他们绕南美极端运到东岸，不如利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苦力来得便宜和快捷。华工从1854年开始潮涌而来，光这一年就有1.3万人。这些华工受到中间人的拐骗、利诱，甚至被强行捉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签订自卖身契，约定一定年限，待旅费和人头税等代支全部抵消后，方能自由行动。旅途中他们拥挤在肮脏的船舱，伙食败缺，长途颠簸，有病不得治疗，死于旅途者为数不少。抵岸后，他们被分派至荒野矿场，终日辛劳，在恶劣的条件下担当最繁重、最危险、白人不愿承担的工作，受到矿主敲骨吸髓的剥削。

天津和北京的一系列条约签订后，列强要实现条约赋予的特权，便积极扶植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早在1860年6月，美国人华尔(Fröderick T. Ward)在清政府地方官署支持下招募在上海的外国冒险家和亡命之徒组成“洋枪队”，从太平军手中夺取松江，因而受到上海官僚买办集团的重视。1861年8

月，华尔改组军队，招骗中国人为士兵，而以欧美人为军官，用新式武器装备，进行新式训练。到11月这支军队发展到2000多人。1862年初，太平军由浙江进军上海，华尔的军队帮助清军阻止了太平军的进攻。清政府授华尔四品顶戴花翎，并称他的军队是“常胜军”。8月，华尔在进攻慈溪太平军时毙命。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赶忙向清政府表示，应该选一个美国人来接替华尔的职务。在与英、法进行一番竞争后，原来华尔的助手、美国人白齐文(Henry A. Burgeving)担任了“常胜军”的管带。1863年初，白齐文的职务为英国人顶替，这支军队也为英国人所控制了。翌年，太平军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镇压下归于失败。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列强积极扩张其在华势力，把通商口岸从沿海推向内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逐渐形成。对于清政府，它们实行所谓“合作政策”。美国公使蒲安臣是这一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有约各国应当互相协调，“共同维护通商口岸的秩序”，并应帮助清政府巩固其统治，而不应在对华关系中动辄使用武力，同时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义务”。蒲安臣因此得到清朝统治者的好感和信任，成为第一个对清政府享有重大影响的外国公使；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对他简直言听计从。

1868年蒲安臣任满。当时清政府正担心各国乘修约之机(中英《天津条约》规定10年后对条约进行修订)肆意要挟，想遣使出洋，“笼络”各国，为修约作准备，但苦于没有适当人选。蒲安臣毛遂自荐，总理衙门于是聘请他为中国全权特使，并派两名中国官员随同出使，访问欧美各国，但未授权他订立条约。这是中国向欧美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

蒲安臣到美国后，竟擅自越权，于1868年7月28日与国务卿

西华德(W. H. Seward) 订立了《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八条。<sup>①</sup>用西华德的话说,这个条约中“囊括了当前美国政府认为亟需用修改1858年条约的办法来加以调整的全部主要事项”。<sup>②</sup>条约主要内容为:

一、条约重申了1858年《天津条约》保护传教士的规定,进一步为美国在通商口岸和内地传教扫清了道路。从1868年到1918年是美国在华传教事业大发展的时期,美国派到中国的传教士达2500多人,占了它派往海外传教士8000人的1/3强。<sup>③</sup>无论在传教、办学和开办慈善事业方面,美国都超过其他西方国家。随着传教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也此伏彼起。条约的此项规定,正是为了使清政府更明确地承担镇压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义务。

二、条约规定,两国人民均可在对方进入大小官学,并受最惠待遇,双方都须在对方设立学堂。这一规定与上一条款密切相关。几十年来美国传教士在华惨淡经营,收效甚微,正如有的传教士所抱怨的:“我们的传道听的人少,嘲笑的人多,大多数人不予理会”。美国教会认为办学能争取更多群众,尤其是影响上层知识分子,通过教育灌输西方文化是使中国“基督教化”的基础,因此特别注重办学。1869年在华基督教学校共有学生4389人,1876年增到5917人,其中大部分是在美国教会系统。<sup>④</sup>同时,《蒲安臣条约》也刺激了清政府选派青少年赴美留学。容闳于1860、1870年两次提议派留学生赴美,曾国藩、李鸿章等出于搞洋务的需要支持这一主张。从1872到1875年,

①约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61-263页。

②卫斐列:《蒲安臣与中国派赴外国的第一个使团》(Frederick W. William: 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第152页,纽约,1912年版。

③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第442页,纽约,1929年版。



清政府共选派詹天佑等120名青少年赴美，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也是中国大规模直接向西方学习的开端。这些学生回国后，在我国造船、铁路、采矿、机器制造、电讯各业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第一代工业技术专家。

三、条约规定，两国人民可随时自由往来，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不得禁阻，这比《北京条约》的有关规定又进了一步，美国据此得以扩大招收华工。

当时美国正在大力开发西部。1862年国会通过建造横穿北美大陆铁路的建议，对华工需要量大增。订约后的10年中，每年华人赴美皆在万名以上。以华人为主体(占90%)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人们越过内华达和落基山脉的丛山峻岭，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筑成中央太平洋铁路(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到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的西段；在修筑南太平洋铁路(旧金山经尤马、图森到德克萨斯州)时，被雇佣的华工约占工人总数的75%。1.5万名华工参加了修建北太平洋铁路(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华工还参加修建了从堪萨斯经阿尔伯克基到洛杉矶的铁路和其他铁路。这些铁路的建成从政治上有利于美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从经济上大大促进了中西部的开发和整个国家的繁荣。而华人对这些铁路的修建作出了卓越贡献，有的主管工程师称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铁路工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首任董事长、加州首任共和党州长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在1865年10月10日给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总统的一份报告中是这样评价华工的：“作为一个类型，他们朴实、和平、忍耐、勤劳和节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在国会法案所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这一伟大的全国性工程[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西段。”<sup>①</sup>

<sup>①</sup> 陈依范著、郁怡民等译：《美国华人》，第79页，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